

大江健三郎：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陈众议

提 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其人其文并非仅限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一符号那么简单。学术界一旦把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意图置于东西方文学交融的视域之中，他的人道主义关怀、童心未泯的利器，发乎“想象”，又指向“真实”，或者反其道而行之的手法，便显形于其小说文本之中；本文试图剥开大江文学的层层外壳，探索其小说创作过程中闪烁的鲁迅和堂吉河德的影子，厘清大江文学“虚构”与“现实”互为表里、内外呼应的逻辑关系，透视出大江作为文学家驾驭“童心”意识的非凡笔力和无所不在的人道主义精神。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人道主义；创作理念；童心意识

Oe Kenzaburo: A great humanitarian

Chen Zhongyi

Abstract: Japanese writer Oe Kenzaburo, whose people and literature are not limited to the symbol of the Nobel Prize winner. Once the academic world puts his literary thoughts and creative intentions into the horizon of the fu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ture, his humanitarian care and childlike threats are “imaginary” and “real”, or vice versa. The way of doing things emerge from the texts of his nove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rip the layers of Oe literature, explore the shadows of Lu Xun and Don Quixote flashing in the process of his novel creation, and clarify the “fiction” of Oe literature. “Reality” is a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which reflects the extraordinary power and omnipresent humanitarian spirit of Oe as a writer who controls the “childlik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Oe Kenzaburo; humanitarianism; creative concept; childlike consciousness

“用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

这是瑞典皇家学院对大江先生的评价。但是，我们在越秀外国语学院宝地重读大江、讨论大江，却不是因为瑞典皇家学院的评价，也不是因为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

始终是世界一切和平人士的朋友。

在若干场合，我曾当着大江先生的面，说他是爱国主义者。理由很简单：他和我们一样，认为日本只有同中国交好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而大江先生不遗余力，甚至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和写作之中，难道不是因为爱日本，而且爱得彻底？譬如鲁迅先生对我国旧体制和国民性的批判。

一 人道主义的创作理念

大江先生对爱国主义这样的评价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嗔怪。据我理解，他的不以为然和他的嗔怪大抵基于以下几点：一、爱国主义无法涵括他的情怀和境界；二、日本的现实实在让他失望；三、反战是一切人道主义者的基本精神。

我尊重先生的意愿，改称他为人道主义者。那么大江先生的人道主义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一是行为方式。从青年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到和加藤周一等文化名人共同缔造“九条会”，等等。

二是创作理念。从《愁容童子》和《小说的方法》等众多著述可以看出，大江先生执着地用想象抵消和颠覆丑陋的现实。他在《小说的方法》等学术著作中多处谈到想象力问题，他援引布莱克关于“想象力是人类生存本身”的观点，对巴尔扎克、贡布罗维奇、格拉斯、勒克莱齐奥等作家的想象进行了分析。他将想象力与陌生化结合起来，认为勒克莱齐奥把亚当变成老鼠，实际上只是“一只差不多移居到亚当意识世界中的老鼠……”这只老鼠本身是想象，同时具有唤醒（读者）想象力的功能，“表现出作为物的坚固特征。这是只‘陌生化’了的老鼠”。^[1]当然，这是极而言之。

在笔者看来，大江文学的想象其实就是虚构，甚至是幻想。而想象或虚构或幻想问题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大江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独特认知不仅体现于他的上述观点，而且更为丰富地表现于他的小说创作。简要地说，他的小说基本上是在真实与虚构的平行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颠覆和覆盖中进行的。

许金龙教授一直认为大江先生是东西方现代文学的集大成者。这是很有道理的。东方文学主要指大江先生熟识的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等，而西方文学则是他治学的专业：首先是法国文学，继而是英国文学、德国文学、西班牙文学；此外，还有俄国、苏联文学等。

如前所述，大江先生不仅是文学家，他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邻居，也是大先生鲁迅的忠实读者和研究家。因此，大江先生不仅能给予我们文学的滋养，还可以助益我们反观本国文学，尤其是当前我国作家和读者的认知和审美维度。

说到想象，我的考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幻想美学在法国兴起，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或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法国盛行。大江先生正是在那个时期学习法文，专修法国文学的。

史忠义教授在梳理中西文化关乎虚构或想象问题时，从本体论出发，认为中西方在虚构问题上的初始认知并不一样：原因之一是《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当时真实社会风貌的反映，人们丝毫没有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原因之二是老庄信奉自然，所谓道法自然，这种观念也不怀疑大自然的真实性……西方则不同。由于荷马史诗和雅典悲剧或颂扬奥林匹亚山诸神，或以传奇中的英雄人物为对象，与眼前的真实相去甚远，故而人们对艺

术内容的真实性甚为疑惑。^[2]这当然不无道理，但问题的是：

一、中国除了《诗经》和老庄，也有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还有墨子的“天志”思想（这与柏拉图的“理念”说颇为接近），甚至还有《易》的“以无为为本”思想，等等，且不说植被丰厚的民间传说或谓“野史”；

二、古希腊也不尽是“理念”本体论，早期有巴门尼德的存在本体论，后期有亚里士多德的综合本体论，有学者于是将古希腊本原思想归纳为范畴本体论和宇宙本体论^[3]；

三是双方关于文学虚构或想象的讨论差不多都是从16世纪开始的。西方有塞万提斯和锡德尼爵士，中国有谢肇淛“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4]，袁于令“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云云^[5]。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 大江与鲁迅的精神葛藤

联想到绍兴，我想说的是，大江先生和大先生鲁迅的相似性。大江先生将自己等同于愁容童子，亦即当今的堂吉诃德。而大先生鲁迅虽然从未将自己同堂吉诃德划等号，却被“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讥嘲为中国的堂吉诃德。

一、大江先生的小说时常虚虚实实、虚实相生。但他的不同或高明之处在于其创作往往更为丰富地以想象填充真实、改变真实。这是时代及大江本身赋予小说的制高点。早在1979年，大江先生就在借鉴诺曼·米勒的“政治想象力”等观念的同时，还从与之相对应的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的“民众集体想象力”得到了启发，把政治想象力和民众想象力联系起来，为他的“中心-边缘”理论奠定了基础。^[6]

大江先生的政治想象力至少包含着两大维度。其一是作为创作者的他，对政治，尤其是日本政治的把握与想象；其二是政治本身的想象力，即对象化了的想象力。前者在许多介入文学中司空见惯，而后者才是大江先生对日本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

大江的小说常常发乎“想象”，又指向“真实”，或者相反。譬如他的早期作品《十七岁》(1961)和《政治少年之死》(1961)，双双取材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暗杀事件。杀人犯“我”是年仅十七岁的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小说对其心路历程的想象具有新闻报道般的逼真。内向、孤僻的山口少年经常耽溺于自慰，并在黑暗中幻想着杀死“敌人”；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自卑感。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与右翼团体“皇道派”结缘，从此接受极端的国家主义训练，终使脱胎换骨。他全身心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了天皇这棵永恒的大树上的一片嫩叶”，并确信自己是天皇之子。他于是克服了死亡的恐怖，成为“皇道派”最年轻的一员。他勇猛果敢、无所畏惧，最终将刺刀对准了向正在讲演的浅沼委员长：一刀！一刀！再一刀！

同样，在他的作品中，代表草根文化的“民间想象力”既是方法，也是对象，而且是大江文学创作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大江先生的早期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便是围绕“森林峡谷的山村”所代表的百年（1860~1960）“土著性”所展开的，它就充分体现了柳田民众共同想象力（或谓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所体现的集体无意识非常接近，而魔幻现实主义从塞万提斯那儿得到的最大恩惠便是将想象或想象力对象化。在此，大江先生同他日后心仪的鲁尔福、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殊

途同归，藉对象化了的民间想象力与中心（政治）话语即“现代性”相对抗。

许金龙教授认为，“在《万延元年的足球》和《同时代的游戏》以前的作品中，森林是相对于都市文明、现代和人工而存在的民俗文化、历史和自然的象征，发生在那里的现代神话故事或流传的民间传说张扬的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治疗、救赎、净化和再生精神”，但《万延元年的足球》却是边缘抵抗中央的见证。此后，在《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林中不可思议的故事》、《致思华年的信》、《燃烧的绿树》、《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二百年的孩子》等长篇小说中，大江先生有意放大故乡的神话/传说以“还原历史的真实，进而与官方书写或改写的不真实历史相抗衡”。^[7]

其中《愁容童子》是大江先生藉想象以抗衡“真实”的力作之一。书中写道：“我的主人公为什么不愿继续住在东京这个中心地，而要到边缘地区的森林中去呢？也算是我的身份的这位主人公，是想要重新验证他自己创作出的作品世界中的根本性主题系列，更具体地说，就是乡愁中的每一部分。尤其想要弄清楚有关‘童子’的一些问题。存在于本地民间传说中的这种‘童子’，总是作为少年生活于森林深处，每当本地人遭遇危机之际，‘童子’就会超越时间出现在现场，拯救那里的人们。”^[8]《愁容童子》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如是说。古义人要写自传体小说，一部“童子”小说，或谓关乎“童子”的小说，而他的朋友罗兹则一直热衷于研究《堂吉河德》。于是，古义人和堂吉河德开始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最终二而一、一而二，难分难解。于是，我也不由得想起热衷于幻想美学研究的罗兹们和凯卢瓦们。

然而，古义人和堂吉河德原本就是同一类人。按照罗兹的说法，“每当我阅读《堂吉河德》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位乡绅年过五十还保持着那么强壮的体魄……而且，不论遭受多大的挫折，他都能在很短期间内恢复过来……古义人也是，一回到森林里就负了两次严重的外伤，却又很好地恢复过来，虽说受伤后改变了形状的耳朵恢复不了原先的模样……堂吉河德也曾在三次冒险之旅中受伤，恢复不到原先状态的身体部分……有被削去的半边耳朵，还有几根肋骨。”^[9]事实上古义人也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是DQ类型的少年吗？答案是NO！古义人是DQ类型的幼儿，所以他能够成为飞往森林的‘童子’。”^[10]于是，在古义人—堂吉河德—童子之间出现了一种必然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江—古义人—鲁迅—堂吉河德—童子之间出现了一种必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并逐渐升华为主旋律。

二、鲁迅同《堂吉河德》也是颇有渊源的。首先，他笔下的阿Q完全是堂吉河德的影子，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胜利者，而且名字的首字母都是一个Q；其次，鲁迅先生早在1924年前就已收集了好几种《堂吉河德》日译本。后来还约请郁达夫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堂吉河德》（1928），并和瞿秋白一起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河德》（1933）。因此，当“创造社”和“太阳社”拿“中国的吉河德”攻击鲁迅时，鲁迅给予了严正的还击，中共中央也曾派遣李立三前去劝阻，这场论战方告结束。同时，关于鲁迅和《堂吉河德》的学术讨论至今没有停止。而大江先生的加入，又让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堂吉河德的重要。

三、温陵居士李贽视童心为本真之源，谓童心失，则本真失。盖因“童心者，心之初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

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发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

“夫心之初，曷可失也？”但古今圣贤又有哪个不是读书识理的呢？这不同样是一对矛盾、一种悖论吗？于是李贽的劝诱是“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

安徒生从西班牙作家马努埃尔那里借来《皇帝的新装》，却把戳穿谎言的任务交给了一名儿童，而非原先的奴隶。这样一来，安徒生便为李贽的童心本真说提供了极妙的佐证。

结 语

美则美矣，然而它实在只是李贽的一厢情愿、想入非非罢了。因为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住自己、留住童年的。这的确是一种遗憾。

好在童心之真未必等于世界之真，人道（无论是非）也未必等于天道（自然之道）。由于认识观和价值观的差异，真假是非的相对性无所不在，其情其状犹如人各其面。倒是李贽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感叹，使我不能不回到艺术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说。

古义人显然也是他这个时代的“童子”，一个以天真对抗世俗的愁容童子。而这种童心内化成了大江先生的想象，同时又外化成为他的人品和文品：人道主义。

这有点像福柯不经意间重复的李贽式悖论：话语（道理）使人异化，但若没有话语（道理），人又怎能成其为人？这样的悖论将永远激荡在文学当中，徘徊于真实与想象的临界或边缘。而这正是文学存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童心。只有儿童不把文学当文学，也不把游戏当游戏。而大江先生何尝不是这个时代最纯粹的儿童呢？！他的纯粹使得他的人道主义与现实产生了类似于量子纠缠的奇妙关系。

注释：

- [1]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王成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57页。
- [2]史忠义：《中西比较诗学新探》，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至189页。
- [3]寇鹏飞：〈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探寻〉，《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20页。
- [4]谢肇淛：《五杂俎·十五事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 [5]袁于令：〈西游记题词〉，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93页。
- [6]王琢：《边缘化：民众共同的想象力—大江健三郎政治想象力论》，《国外文学》2003年第4期，第65页。
- [7]许金龙：《译序：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载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译序部分第3页。
- [8]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许金龙译，第163页。
- [9]同注[8]，第136页。
- [10]同注[8]，第108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